

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原因之异同

——对《第三波》转型原因观点的验证^①

龙 异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9)

[关键词]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民主转型; 原因

[摘要]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进入民主巩固阶段, 对过去转型的分析有助于对现阶段民主巩固问题的理解。地处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民主转型经验, 以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关于民主转型原因——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五个因素分析为基础, 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 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这一因素可能是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普遍原因, 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四个因素可能只是适用范围较小的民主转型原因。

[中图分类号] D73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8)02-0026-07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in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An Examina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Reasons of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Long Yi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Keywords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Reasons

Abstract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hase, it is useful to analyze the past cases of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and such are the cas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Based on the five reasons of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listed in Huntington's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hich are the declin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and legitim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igious change, direct influence of outer factors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the paper compares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and reaches the conclusions: the declin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and legitimacy is the common reason for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while the other four can only be the reasons for the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in small scopes.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世界政治的版图发生巨大变化^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到世界大多数原来并非民主政体的国家^②, 使 潮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大多数受其影响的国家已

* [收稿日期] 2007-11-14

[作者简介] 龙异,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04 级博士研究生, 贵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① 《第三波》即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著《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刘军宁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

② 第三波之名来源于注①著作。

③ 按“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统计标准, 截至 2000 年, 世界所有 192 个国家或地区中, 民主国家或地区有 120 个, 占 62.50%。参见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Introduc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

完成转型并处于新民主政体的维系和巩固的阶段^①。新民主政体的巩固与诸多因素有关,亨廷顿等学者都认为前一阶段的民主转型对后一阶段的民主巩固有重要影响^[1]。联系到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现阶段民主实践,本文在简单总结两国转型前政治发展的一些相似之处后,以它们转型原因的比较来验证和判断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关于转型原因的分析,希望得到一些有益于现阶段民主政体巩固的判断和推论。

一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前政治发展的一些相似之处

一般认为东南亚地区称得上民主政体的国家仅菲律宾、印尼和泰国三国^[2]。然而,在泰国军事政变后的今天,东南亚地区仅菲律宾和印尼保持了较为完整的民主政体。1972年马科斯实行军管法以前,菲律宾的政治体制被视为“东方民主橱窗”^[3],而在1986年马科斯下台以后,这一民主橱窗在关闭了14年之久后重新开启。1998年苏哈托在人们的反对声中辞职后结束了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统治,印尼开始进入民主化进程,其民主成就被西方誉为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②。在东南亚区域里,菲律宾与印尼从上世纪后期以来的政治转型非常引人注目,这也是两国在二战结束后独立建国以来政治发展的继续。为了更好地理解菲律宾与印尼在上世纪末期的政治转型,本文拟对两国在转型前政治发展的某些相似之处做一简单分析。

关于菲律宾与印尼各自的政治发展历史,学者的梳理较多^③,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关注菲律宾与印尼民主转型前的政治发展中那些有助于说明两国转型原因异同的相似之处。

第一,两国都有较长的被殖民经历。菲律宾在1898年美西战争前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受其控制达300多年,而在美西战争后作为美国的殖民地也有半世纪之久;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对菲律宾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尤以美国的影响较

大。菲律宾独立后实行总统、两院国会和法院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以及两党制的政党制度,这些制度皆为美国模式的翻版,而西班牙殖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基本国家机构的构建和政治文化上的天主教色彩上^[4]。印尼在荷兰的殖民统治下经历了300多年的历史,是荷兰在海外的主要殖民地。30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并没有给印尼留下很多有益的遗产,但在政治方面却有一些重要因素影响着印尼后来的政治发展,较显著的两点是松散的以爪哇岛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架构和不太严密的印尼民族概念^[5]。

第二,两国在二战后建国初都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民主经历。大多数人只注意到菲律宾在二战后马科斯军法管制前26年的民主经历,但印尼在苏加诺“指导民主”之前的民主经历却不太引人注意。其实从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起到1950年统一的印尼共和国成立时,印尼已经历了五年出现五届内阁的民主时期^[6],随后又经历了九年的议会民主时期,直到1959年苏加诺的“指导民主”时期,合计算来,印尼也曾经经历了不短连续14年的民主时期。尽管印尼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民主经历具有严重冲突不断、党派纷争激烈等不良现象并因此走入末路,但它对后来印尼的政治发展却有不小的影响。

第三,两国在威权^④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相似性。菲律宾马科斯统治下的威权政体主要是个人独裁的威权政体,但它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军人干政色彩,军人较深地涉入政治经济生活^[7],而1978年后马科斯也依靠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党”(KBL)作为工具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8]。可见,马科斯独裁政权是一个以个人独裁为主,兼具军人政权、一党专制色彩的威权政体。印尼苏哈托政权是一个苏哈托本人、军队和“专业集团”(GOLKAR)三位一体的威权政体,其核心是苏哈托,军队势力深深影响到印尼各个层面的政治经济生活,是苏哈托政权的两大支柱之一,而专业集团

① 关于民主巩固的观点很多,概念也很混乱。参见 Andreas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ibid.*, p. 150.

② 从人口数量来说印尼在民主国家中居印度和美国之后,所以称之为“第三大民主国家”。

③ 国内出版物中较详细的梳理可参见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④ 关于威权政体或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涵义尚无统一论,国内学者对它的论述也很多,参见:陈峰君教授论文《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载于《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4期,第68-69页;陈尧博士论著《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43页,等等。本文注意到,很多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论著都将非民主政权统归到威权政体的名称下,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也在其列。考虑到不管非民主政体是何种政体,其民主化过程都是向民主政体转型,因此将所有民主化转型前的非民主政体都归到威权政体旗下并无不可,这一划分便于相关问题的展开与论述。然而,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并非每一个威权政体名下的非民主政体都是相似的,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有鉴于此,本文的威权政体指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威权政体,即所有非民主政体皆为威权政体。按亨廷顿的划分,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威权政体主要应属个人独裁威权政体,而本文赞同将苏哈托下的印尼威权政体视为一个以个人为核心,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和一党专制三合一的综合威权政体。

作为苏哈托政权的另一大支柱控制着国家的政治大权。从以上分析中可看到,不管是菲律宾还是印尼,其民主转型前的威权政体都具有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和一党专制等三种政体的特点。

第四,两国一直都实行总统制。菲律宾照搬美国体制,独立建国后一直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既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也是有实权的政府首脑。印尼的总统制经过几次变化,期间既有总统制下的议会内阁制,又有美国式的总统制,到苏加诺的指导民主后,与菲律宾相似,印尼也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普沃斯基等人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民主的总统内阁制比民主的议会内阁制更难维持,更容易倒向威权政体^[9]。菲律宾与印尼在倒向威权之前的体制都是总统内阁制,且两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这验证了普沃斯基等人的分析。为何两国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中还采用总统制呢?普沃斯基等人的分析是,过去的政治发展对现在的制度选择有重大影响^[10],尤其是主要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发展的历史中一旦存在便不易改变。这再次让我们意识到对过去政治发展的状况做必要的说明和分析将有利于阐释现时的政治发展与变迁。

从菲律宾与印尼的一些相似之处可看出,两国并非完全各异,因而本文也认为并非不能相互比较,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两国民主转型原因的比较来验证亨廷顿《第三波》中关于转型原因的分析,并希望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比较对《第三波》转型原因观点的验证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从上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后,关于民主转型的著述随后也开始大量出现^①。本文采用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关于转型原因分析的观点作为比较菲律宾与印尼民主转型的出发点。在《第三波》中,亨廷顿全面分析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整个过程,主要包括转型原因、具体转型模式及转型特征、转型后新民主政体的持久等内容,本文只关注他对第三波转型原因的分析。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五组: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

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11]。用变量语言来描述,民主转型是因变量,而转型原因是自变量,对已经发生了民主转型的国家来说,因变量都是同一个——民主转型,而作为自变量的原因却可能是上述五组原因中的一个或几个,甚至全部。在《第三波》的原因分析中,哪些原因可能具有普遍性,哪些原因可能仅适用于少数国家,亨廷顿没有全面分析。本文将《第三波》中的民主转型原因解析后,应用菲律宾、印尼民主转型的比较经验来简易验证并判断“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的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的直接影 响和示范效应”等五组可能的“民主转型原因”与“民主转型”之间因果关系的普遍性或特殊性。

(一) 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

亨廷顿写到“合法性是政治分析家们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12],本文不具体分析合法性的含义,而是直接以亨廷顿的观点为标准。民主转型前威权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可能有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负面合法性^[13]等,而合法性更重要的来源是政绩,这些来源单独或几个组合起来为威权政体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一旦威权政体的合法性下降,则民主转型就可能发生,对大多数第三波转型国家来说,政绩与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最为密切^[14]。本文首先用政绩与合法性的关系来分析菲律宾与印尼的民主转型原因,然后再比较两国的实际经验以验证和判断亨廷顿关于这一转型原因的分析。

在菲律宾,尽管不否定马科斯的权力欲导致了他在 1972年实行军管法,但当时菲律宾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混乱也是事实^[15],在军管法实施的最初几年里,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经济也有所发展^[16]。可见,马科斯的独裁统治最初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政绩并因此具有了合法性。然而,进入上世纪 70年代后期,石油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衰退也波及到菲律宾,加之多年的独裁专制统治,“从 1980年开始,菲律宾的人均国民收入稳步下降”^[17]。政治上,军管体制的合法性也遭到质疑,马科斯被迫于 1981年取消军管法。军管法取消后到 1986年,马科斯依然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然而,在各种社会

① 对民主转型研究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著参见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经济矛盾的推动下,各种组织和运动自军管法取消后风起云涌,人民要求举行自由公正选举和结束马科斯专制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马科斯统治的合法性急剧下降。而在军队方面,当初支持马科斯实行军管法的军队也不再支持他的统治,“在1986年的二月革命中,部分军队的倒戈成为马科斯垮台的关键因素之一”^[18],马科斯政权的合法性彻底丧失。最终,在1986年的一场充满马科斯欺诈行为的选举中,“人民力量”运动发动的“二月革命”将马科斯赶下台,阿基诺夫人宣布当选菲律宾总统,菲律宾完成民主转型而进入一个新时代。

在印尼,1965年“9.30”事件以后,苏哈托依靠军队获得执掌印尼的大权,随后统治印尼长达30多年。苏哈托的政权以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率获得印尼人长达30多年的支持,苏哈托本人也被誉为印尼“建设之父”^[19]。“1969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到1994年完成第五个五年建设计划,作为第一个25年建设长周期。在此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7%。”^[20]苏哈托威权政权30多年的合法性显著地建立在该政权取得的经济成绩上。然而,在统治印尼多年以后,苏哈托政权在经济方面,“这种经济制度不仅造成了极度的两极分化,还导致了严重的贪污腐败。这激起了人民对政府的强烈不满。”^[21]在政治方面,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挑战,“50人集团”、“民主论坛”等组织与运动从1990年代初便活跃起来^[22],“与此同时,军人的离心倾向也日益显露”^[23]。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印尼经济一落千丈,“国内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的8%下跌至1997年的4.6%。”^[24]同时,其它长期受压制的社会矛盾,比如宗教种族冲突问题、地区分裂问题,也在金融危机中爆发出来。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总爆发,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极度衰减,1998年5月,苏哈托在任满前辞职,印尼进入民主化时代。

在菲律宾、印尼两国的威权政权转型前,两国都出现了政绩的下滑,不管是普通民众、主要社会政治力量,还是军队,都不再支持威权政权,政权的合法性大大下降,结果两国都发生了民主转型。可以判断,合法性与政绩的下降都导致了菲律宾、印尼的民主转型,它是两国转型的共同原因,而我们还可进一步得出结论,亨廷顿将合法性与政绩的下降作为民主转型的原因之一,这一原因可能具有

普遍性。

(二)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李普塞特的研究最先令人信服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的相关关系^[25],而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如达到某一期间,则民主转型更容易发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始于1974年的民主化浪潮是前二十年经济成长的产物。”^[26]他同时给出了一个70年代有可能导致民主转型的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的经济过渡地带:500-1000美元(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27]。

在马科斯统治下,20世纪80年代初的菲律宾经济深受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和外债的巨大影响,经济发展年年下滑。亨廷顿在《第三波》里将菲律宾归入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经济过渡地带但出现了民主转型的六个国家之一^[28],很明显,菲律宾的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没有关系。

印尼在苏哈托统治下,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断上升。“印尼的人均收入增长也较快。1969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人均收入只有90美元,当时属世界最穷国家之一。1984年完成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人均收入增至450美元。到25年后的1994年,人均收入达920美元,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29]按亨廷顿的经济过渡地带标准,印尼已接近这一标准的上限,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当然,亨廷顿在《第三波》中也写道:“不过,全面的经济发展继续下去,而且因此区别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过渡地带中的收入水平也不断上升。”^[30]到了1990年代,当初的过渡地带标准也应该有所上升,可以肯定超出了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给出的500-1000美元(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的标准,但本文估计上升了的过渡地带标准也应该将人均收入接近1000美元的印尼包括在内。印尼在苏哈托时期取得的经济发展是巨大的,其实质性也值得信赖,印尼的人均寿命、教育事业和城市发展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31],“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从60年代的5400万降到1990年的3000万”^[32]。亨廷顿认为“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33]对此论断,印尼提供了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正是因为苏哈托时期的实质性经济发展与1997年的金融危机相结合,苏

哈托威政权才最终在 1998 年垮台。

从菲律宾的转型经验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肯定不是民主转型的原因, 然而, 通过印尼经验的分析, 可以肯定,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印尼民主转型的原因之一。比较菲律宾、印尼的转型经验, 可以判断, 在《第三波》中所列的五组转型原因中,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转型原因。

(三) 宗教变化

亨廷顿认为, 宗教变化对民主转型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宗教为人们提供的信念和宗教教义及其组织方式的改变是否有利于民主两方面^[34]。在《第三波》中, 亨廷顿分析了基督教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扩张, 以韩国为例说明了这种扩张对人们的信念产生了有利于民主的影响; 而更主要的是, 不管从教义上看, 还是从组织方式上分析, 天主教都出现了有利于民主的转变。

西班牙殖民使菲律宾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天主教国家, 如今, 天主教徒占人口总数的大多数, 正是基于此, 派伊认为菲律宾更像一个南美国家^[35]。在亨廷顿的《第三波》中, 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受宗教变化影响而出现转型的第三波国家, “辛主教在结束一个政权和改变国家的政治领导中扮演了比 17 世纪以来任何天主教教士更加积极和更加有影响的角 色。”^[36] 宗教变化作为菲律宾民主转型的原因是确定的。

印尼与马来西亚同为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 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大多数, 但印尼历届政府皆强调政教分离的原则, 而印尼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不是严格的伊斯兰教教徒^[37]。尽管亨廷顿等学者都认为伊斯兰文化并非与民主不相容^①, 但也有学者写道: “一些研究伊斯兰教的西方学者告诫说, 只有当穆斯林重新阐释伊斯兰教和他们的历史传统以后, 他们才会拥有民主, 因为这些因素对民主弊大于利。”^[38] 这从侧面说明伊斯兰教本身并没有发生多少有利于民主的改变, 印尼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 其伊斯兰教同样也没有改变。在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方面, 一位日本学者的研究也表明, 印尼实质上的政治社会结构在 1955 年至 2005 年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伊斯兰教政治势力也没有显著变化^[39]。可以断定, 印尼的民主化

转型与宗教变化无关。

菲律宾的经验明显地告诉我们宗教变化是菲律宾民主化转型的原因之一, 而这一原因却不适用于印尼经验。综合起来, 本文的结论是: 宗教变化可能并不是第三波民主化的普遍原因。

(四) 外部因素直接影响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 亨廷顿写到 “外部的行动者可以对第三波民主化作出重大的帮助。”^[40] 亨廷顿在《第三波》列出了三类对民主化转型产生重大影响的外部行动者: 欧洲机构、美国和前苏联。欧洲机构的影响主要限于南欧及中东欧的民主化国家, 而前苏联的影响也主要限于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 本文主要分析可能对菲律宾、印尼两国民主转型产生重大直接外部影响的美国因素。

菲律宾自美西战争直至独立建国后在各方面一直深受美国影响, 从经济到政治、从外交到军事等方面皆有美国的影子。美国对马科斯独裁政权的支持直至其垮台前不久, 只有在 “他仍一意孤行, 这时白宫才最后决定放手发动倒马运动。从策划圣诞节政变至二月兵变都有美国人的影响。”^[41] 美国对马科斯独裁政权的放弃是其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亨廷顿写道: “在菲律宾, 辛主教在对反马科斯所作的成功斗争进行评价时观察到, ‘没有美国的帮助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取胜’。”^[42] 可以较肯定地判断, 美国作为外部影响因素对菲律宾的民主转型有重大影响。

印尼的民主转型同样有外部影响, 有学者写道: “然而, 金融危机发生后,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苏哈托最终被迫下台。其外部的压力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43] 但是, 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印尼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分析了国外学者的观点后, 上述同一学者写道: “因此他认为, 显然, 印尼争取民主的斗争主要是由国内的情况推动和决定的, 而不是由外来因素决定的。”^[44] 外部因素对印尼民主转型的间接推动作用主要是下面本文将分析的示范效应, 此处的分析表明, 对印尼民主转型存在重大直接影响的国际因素可能并不存在。

就具有重大直接影响可能的外部因素来说, 美国因素对菲律宾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而印尼的民主转型可能并没有直接重要的外部因素。可以判

①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 前引书, 第 373-375 页。另见 Abdou Filali-Ansary, “Muslims and Democracy”, in Lan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ibid.*, pp. 37-51 等等。

断, 外部因素在第三波中可能不是一个普遍的转型原因。

(五) 示范效应

论及示范效应, 亨廷顿得到三个命题^[45]: 第一, 示范效应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比在前两波民主化中或者说比 20 世纪任何其他一次政治波浪的重要性都大得多; 其次, 尽管日益发达的通讯变天涯为咫尺, 但是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类似的国家中间示范效应仍然最为强烈; 第三, 民主化波浪的肇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对重要性上发生了变化。本文以亨廷顿的这三个命题来分析示范效应对菲律宾与印尼民主转型的影响。

菲律宾在第三波中转型的时间较早, 亨廷顿在解释第三个命题中写道: “示范效应显然不能影响到第一个民主化的国家。第三波民主化中较早的国家是另一些触发因素的产物, 而不是雪球”^[46], 他同时以菲律宾等三国作为例子说明此观点。菲律宾的民主转型不但不是别国示范效应的结果, 反而为其它国家带来示范效应, “受影响最大的是韩国”^[47]。可以较为肯定地判断, 示范效应并不是菲律宾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为 1998 年才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 示范效应在印尼的转型过程中体现得很明显。有学者这样写道: “印尼第一位民选总统阿布杜勒拉赫曼·瓦西德几年前谈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对印尼的影响时说, 这些变化使‘我们看到了一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发生’。”^[48] 从中可看出上述亨廷顿的第一个命题在印尼转型经验中得到证实。而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等“本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所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49], 这同样也证实了上述亨廷顿的第二个命题。在解释上述第三个命题时, 亨廷顿写道: “示范效应的影响未必显著依靠在接受国出现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存在。随着这些雪球继续滚下去, 这些进程自身趋向于成为上述条件的替代物。这一事实反映在其加速度中。”^[50] 印尼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民主转型, 正是这种“加速度”示范效应的体现。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 示范效应对印尼民主转型的影响是明显的。

示范效应作为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原因, 从菲律宾的经验来看, 由于菲律宾转型时间较早, 这一原因不起作用; 但在印尼的民主转型中, 其它国家转型的示范效应是明显的。由于转型的时间有先后,

示范效应显然不是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普遍原因。

三 结论

经过对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转型经验的比较, 本文简单地验证并判断了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对转型原因所作的分析。有两方面的结论: 一方面, 用亨廷顿关于第三波民主转型的五组可能原因(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对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的转型原因分别进行判断, 在菲律宾的民主化过程中, 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宗教变化和外部因素直接影响等三个因素是造成菲律宾马科斯威权政体垮台并出现民主转型的原因, 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示范效应两因素与菲律宾民主转型无关; 在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过程中, 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示范效应是促使苏哈托辞职下台并实现民主转型的原因, 而宗教变化和外部因素直接影响两因素并不是印尼民主转型的原因。另一方面, 从菲律宾与印尼的转型原因分析中, 本文发现仅“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这一原因是两国转型的共同原因, 本文因此进一步判断, 在《第三波》对五组转型原因所作的分析中, 可能只有“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这一原因是第三波国家民主转型的普遍原因, 而其它四个原因可能仅适用于更少的国家。可以这么说, 当发现有国家出现了民主转型, 如要寻找其转型原因, 首先分析转型前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是否下降也许是一条可取的途径。当然, 在本文的分析中, 结论是初步而简单的, 仅用两个国家的民主化经验来验证和推断任何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假设远远不够。

尽管菲律宾的民主转型已过去了 20 多年,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转型也快 10 年了, 两国都处于转型后的民主巩固阶段, 但两国的民主实践却远非一帆风顺。在此情况下, 回过头去再度分析两国的转型经验也许对如今的民主巩固有所帮助。本文以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对民主转型原因所作的分析为基础, 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转型经验为案例简单地说明验证了亨廷顿的观点, 一方面希望对亨廷顿关于民主转型原因的观点有一些粗浅的判断, 另一方面更希望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转型原因有一些简单的推论和说明。

【注 释】

- [1]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29页。
- [2] 参见顾长永《东南亚政治学》，巨流图书公司（台湾），2005年，第120-121页。
- [3] 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 [4] 参见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 从早期到公元1800年》，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3页。
- [5] 参见钟运荣《试论荷兰殖民统治对印尼现代政治发展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
- [6] 王受业、梁敏和与刘新生编著《列国志：印度尼西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 [7] 同 [3]，第306-307页。
- [8] 同 [3]，第281-282页。
- [9] See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é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What Makes Democracy Endure?",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Ibid.*, pp. 175-177.
- [10] *Ibid.*, p. 175.
- [11] 同 [1]，第54页。
- [12] 同 [1]，第54页。
- [13] 同 [1]，第58页。
- [14] 同 [1]，第58-64页。
- [15] 同 [3]，第208-209页。
- [16] 同 [3]，第212页。
- [17] 同 [1]，第61页。
- [18] 同 [3]，第309页。
- [19] 同 [3]，第199页。
- [20] 温北炎、郑一省：《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 [21] 同 [3]，第196页。
- [22] 同 [3]，第198-199页。
- [23] 同 [3]，第199页。
- [24] 同 [20]，第103页。
- [25] 参见西蒙·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26] 同 [1]，第71页。
- [27] 同 [1]，第71页。
- [28] 同 [1]，第71页。
- [29] 同 [20]，第97页。
- [30] 同 [1]，第70页。
- [31] 同 [20]，第102页。
- [32] 同 [3]，第199页。
- [33] 同 [1]，第83页。
- [34] 同 [1]，第83-86页。
- [35] 参见卢西恩·W·派伊《东南亚政治制度》，刘笑盈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 [36] 同 [1]，第96页。
- [37] 参见方金英《伊斯兰在印度尼西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李文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 [38] 安瓦尔·H·赛义德：《民主与伊斯兰：它们相容吗？》，威亚尔达编、榕远译《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 [39] 〈日〉井上治著，司韦译《从大选看印尼的政治社会结构》，《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2期。
- [40] 同 [1]，第98页。
- [41] 同 [3]，第217页。
- [42] 同 [1]，第108页。
- [43] 潘一宁、黄云静、尤洪波：《国际因素与当代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
- [44] 同 [43]。
- [45] 同 [1]，第114-118页。
- [46] 同 [1]，第117页。
- [47] 同 [1]，第116页。
- [48] 同 [43]，第313页。
- [49] 同 [43]，第319页。
- [50] 同 [1]，第118页。

【责任编辑：吴金平】